

全球史译丛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英] C. A. 贝利 著  
于 展 何美兰 译

1780-1914  
现代世界的诞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英] C. A. 贝利 著  
于展 何美兰 译

1780—1914  
现代世界的诞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英)贝利著；于展，何美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全球史译丛)  
ISBN 978-7-100-09802-1

I. ①现… II. ①贝… ②于… ③何…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研究—1780~1914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23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全球史译丛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

[英] C. A. 贝利 著

于 展 何美兰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9802-1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1.25

定价：65.00 元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中文本根据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翻译

## 《全球史译丛》编委会

**顾问：**齐世荣

杰瑞·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

**主编：**刘新成

**编委：**施 诚 夏继果 梁占军 韩 莉

##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也称“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 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 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 以后演变成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 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 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多年来, 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 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 五年后又提高了十个百分点;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 全国26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 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 75%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 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 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 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 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 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 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 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 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 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 但同时他们也承认, 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 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 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 许多历史学家主张, 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与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 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 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 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 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 19 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惟一可靠依据。这样的

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



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

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查克拉巴迪（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迪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

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远远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任何历史研究都受益于其他许多学者论著的某些观点。本书规模较大，因此深深受惠于一整代的历史学家和早年的其他许多学者。然而，更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与此项工作关系密切，并包容我鲁莽野心的人，尤其是剑桥圣凯瑟琳学院杰出的“历史研究小组”。曾阅读本书并做出深刻评论的包括克里斯·克拉克（德国史）、约翰·托马斯（美国史）、汉斯·范·方德（中国史）、理查德·德雷顿（英联邦史）及本丛书的其他一些人。我很感激这些历史学家，不过书中史实和解释的明显错误当然由我一人负责。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友好地评论了本书有关政治思想的章节。戴维·克利斯汀、多米尼克·利芬和琳达·科利也是有帮助的读者。鲍勃·摩尔的工作大大超出了主编的职责，尤其他在前言中对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苏珊·贝利从在威尼斯的假期中抽出时间阅读本书，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提出了很多改进性的意见。迈克尔·多德森利用其历史和哲学的双重训练指出了本书在论点和措辞方面的许多不连贯之处。卡皮拉力劝我使用大一点的图画。夏尔马也帮助我获得很多正确的知识。简·萨姆森提供了一种太平洋的视角和声音。古哈和雷切尔·罗在插图方面帮助很大。德里克·比尔斯和凯文·格林班克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凯瑟琳·普赖尔高效地制作了索引。还有其他许多人提供了知识、思想和洞见。我非常真诚地感谢他们。他们当然绝不会为本书中难免存在的错误和误解负责。

所有地图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伦敦，1982年）。感谢剑桥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允许我复制图表。

## 凡例

外国单词的音译永远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我尽量采纳印度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中更现代和确切的翻译：例如“Shah abd al-aziz”而非19世纪的“Shah abdool azeez”，但我舍弃了阿拉伯语中的“ain”，因为专家都知道这个词，普通人可能会迷惑不解。在汉语的处理上，我采纳了乔纳森·斯宾塞在《寻找现代中国》中的用法。也就是说，我使用了罗马化的现代拼音体系，而非旧的威妥玛拼音体系（“Qing”而非“Ch'ing”），除了个别英语中已有了习惯用法的词：例如“Canton”而非“Guangzhou”。比较而言，我认为“Beijing”如今已经完全可以取代“Pekin”和“Peking”了。

关于介绍和引用，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过去一代人出版的大量杰出的地区史和国家史的基础上的。这包括牛津和剑桥世界史、剑桥简明世界史、朗曼世界史系列及近来刚出一部分的布莱克威尔世界史系列。同样有用的是那些重要的美国教科书，尤其是处理东亚、拉美和美国自身的教材。我大量参考了这些著作，读者将会很容易看到这些书目并查阅它们。当提出一般观点时，我会尽量提供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的事例和证明，它们支持或有时偏离这些总趋势。这将涉及大量著作和一些原始材料，尤其是当读者不清楚出处时更是如此。

然而我在这里不会通过堆砌事实来设法“证明”历史观点。经验主义当道将导致庞大的结构，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那也是不可能的。相反，举例是为了传达一些历史的人类结构，揭示一些历史学家制造的精神联系，这些构成了历史写作的主体。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不同地区的历史学家常常没有意识到其他领域的专家正在下同样的论断，事实上，他们描述的一系列历史进程是紧密相关的。在其他案例中，历史学家已意识到其他附属地区发展的相似与联系（如19世纪的日本和越南的国家构建），但

仍没感到需要把他们的工作放入一个更广的背景中。本书首先设法开始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之间的对话，以更好地理解社会进程间的相似和区别。

本书中不可避免将出现大量人名，若要提供所有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将创造一种“日期困境”，因此我仅仅为一些主要人物谨慎地提供了日期。

书中大量使用了“社会”（society）这个词。不仅保守的政治家，而且许多富于经验的人类学家也否认了“社会”的存在，或至少谨慎地反对使用这一术语。这个词在这里并非指的是扼要表达的、有固定边缘的文化实体，而是广泛的人类行为的历史定义的特性，它能在一个给定的地理区域内被观察。使用这一术语可以在一个全球层面之内或地方层面之上进行广泛的分析。当然把每个社会实体分解到村庄水平或全世界每个村庄内的个人网络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然而正如古典的哲学家说的那样，所有原子“终会落下，成为一体”。

# 目 录

致谢 / 1

凡例 / 2

## 导 言 / 1

本书的结构 / 3

问题一：“第一推动力”和经济因素 / 5

问题二：全球史与后现代主义 / 8

问题三：持续的“现代之谜” / 10

适应标准：生活习惯 / 14

从外部建立联系：交流与复杂性 / 21

## 第一部分 旧体制的终结

### 第一章 旧体制与“早期全球化” / 29

农民与地主 / 29

不同的政治 / 32

在国家边缘的权力 / 39

新政治模式的先驱 / 43

“全球化”的史前史 / 44

古代与现代早期的全球化 / 48

前景 / 51

### 第二章 从旧体制到现代化的进程 / 53

最后的“大驯化”与“勤劳革命” / 53

非洲—亚洲物质文化、生产与贸易的新模式 / 60  
非洲—亚洲“勤劳革命”的内外局限性 / 62  
贸易、金融和革新：欧洲竞争的优势 / 64  
积极的、爱国主义国家的发展 / 69  
爱批评的公众 / 77  
亚洲和非洲公众的发展 / 82  
结论：“后退”、落伍与危机 / 87  
前景 / 89

### **第三章 汇合的革命（1780—1820年） / 93**

当时人对世界危机的沉思 / 93  
1720—1820年世界危机的简明剖析 / 96  
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从法国到中国 / 109  
现代左派和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起源 / 116  
民族性对国家和帝国 / 123  
第三次革命：全世界文雅的商人 / 125  
前景 / 131

## **第二部分 孕育中的现代世界**

### **第四章 在世界革命之间（1815—1865年） / 137**

评估“国家遭受的破坏” / 137  
英国的海上霸权、世界贸易与农业的复兴 / 140  
移民：一个安全阀 / 145  
在“新世界秩序”中的失败者（1815—1865年） / 147  
混杂合法性的问题：它是谁的国家 / 152  
国家赢得力量，但并不足够 / 157



亚洲的合法性战争：一个总结性陈述 / 162  
亚洲革命的经济与意识形态根源 / 166  
欧洲的饥饿和反叛年代（1848—1851年） / 171  
作为全球事件的美国内战 / 177  
一致还是不同 / 182  
回顾争论 / 185

## **第五章 工业化与新城市 / 187**

历史学家、工业化与城市 / 187  
工业化的进步 / 190  
贫穷与工业的缺乏 / 195  
作为生产、消费和政治中心的城市 / 202  
全球危机的城市影响（1780—1820年） / 204  
新城市的种族和阶级 / 207  
工人阶级政治 / 210  
全球城市文化及其批判者 / 213  
结论 / 218

## **第六章 民族、帝国与族裔（1860—1900年） / 219**

民族主义的理论 / 219  
民族主义何时产生 / 225  
谁的国家 / 227  
使民族主义永存：记忆、全国联系和印刷 / 229  
从社会到民族：欧亚帝国 / 233  
我们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 / 240  
无国家的人民：迫害还是同化 / 242  
帝国主义及其历史：19世纪晚期 / 251  
“新帝国主义”的维度 / 252